



#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转向与拓展

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ross-Strait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胡庚申 © 主编



#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转向与拓展

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ross-Straits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胡庚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转向与拓展 / 胡庚申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446-0232-7

I. 翻… II. 胡… III. 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7816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字数 666千字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232-7 / H · 0098

定 价: 47.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 主编序言

胡庚申

2005年7月的北京,艳阳高照,酷暑难耐;连日的“桑拿”天,又给人们平添几分燥热。然而,对于美丽的北京清华园来说,这个盛夏却果实累累,因为备受翻译界瞩目的“首届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本次大会收到了祖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等地56所院校的71位学者提交的论文全文或论文摘要。研讨会采取“报告”和“评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为五个专题:翻译学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专题、新译论/新视野研究专题、翻译与文化研究专题、文学研究专题和口笔译教学研究专题等。

## 一、翻译学科建设与翻译理论研究

翻译学科的建设问题,一直受到翻译学界的关注。杨自俭教授在题为“如何推动翻译学的建设与发展”发言中提出了翻译学科建设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创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译学建设与规划阶段;第三阶段是学科建设与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学科成熟独立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个很长的酝酿或者萌芽期;第二阶段运作好大约要20年;第四阶段还无法预测。杨教授认为,我们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三件事中的前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第二件事是提出并确立学科建设的指导方针;第三件事是议定学科建设的标准。前两件事已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是参与译学建设的多数学者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和学科已经有了独立的地位。第二阶段的主要建设规划包括:(1)教师队伍建设规划;(2)教育教学计划;(3)学科建设规划,重点应该是学科理论系统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研究、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方法论的研究;(4)制度建设规划等。

许钧教授在题为“我国译学界当前应该面对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中指出,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拓展,翻译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翻译学二级学科的确立便是明证。但从目前译学研究的现状看,有几个重大问题应引起译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是关于翻译学科的立身之本的问题;二是关于翻译理论研究潜在的危机;三是关于翻译的历史使命;四是如何面对当前重大的翻译实践问题。他认为,翻译学科的立身之本乃是能否培养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因此,要求译学界从独立的翻译学科的建设高度出发,增强学科意识,借鉴国外的办学经验,统一规划办学的目标,明确翻译学科的任务,切实加强理论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不少与会者都对译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谭载喜教授认为,译学建设不要再争论是不是“学”、有没有“用”之类的问题了,而要脚踏实地去做具体的事情。穆雷

教授在自由发言中提到,她参加这次会议的切实感受是学科建设与师资培训的紧迫性。

翻译理论与翻译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由于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因此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将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和多学科性。许钧教授认为,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如同“盲人摸象”。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一步步失去自身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亚猛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先吃透再创新。要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精神。学习西方翻译理论时要有批判的精神,把不同的理论当作工具,而不是教条。他认为理论研究应对翻译实践进行干预,手段是通过理论促进翻译批评的繁荣,通过翻译批评促进翻译理论的改进。刘教授的论文“‘存异’还是‘化同’——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看韦努蒂的‘翻译伦理’”谈的归化和异化远远超出了翻译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对韦努蒂的“存异理论”进行了批判。张经浩教授赞同刘亚猛教授的观点,认为西方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教条。理论如果对实践不起任何作用,就没有用。奈达的翻译理论地位高,是因为他的理论对《圣经》的翻译作用很大。理论和实践不应脱节,很多低质量的翻译出自搞翻译研究的人身上。搞翻译理论的人不写译评,不翻译东西,而且99%的翻译理论是借鉴外国的翻译理论,又如何“东学西进”。

一些学者也就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各抒己见。罗选民教授认为并不是所有理论都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理论是沃土,理论是思维。他还提到了本土理论的挖掘问题。翻译只有影响民众、影响思潮才是重要的。毛思慧教授认为不管文化的定义是什么,不谈什么叫文化,我们应当做点具体的东西。翻译理论不一定非得去指导实践,但翻译理论可以真正促进翻译批评。理论就是一个工具,不一定要抬得很高。台湾学者彭辉荣教授的论文题目是“当中国道士遇上德西达时——混用老庄思想翻译德西达成名文章《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几个有趣问题”,认为用老子道德经和庄子思想看解构主义:道家喜欢谈二元运作的道理,透过这些二元模式来理解解构主义是可行的。台湾学者史宗玲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翻译等值之描述性研究:透过 WinAlign 进行匹配句之人工编辑”。她认为这是一个描述性的翻译等值研究,可以弥补传统等值研究缺乏弹性及偏重理论的缺点。孙会军副教授在“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求同倾向”的发言中认为,这种求同倾向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理论建构中的直接体现,而近几十年来的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后殖民主义所宣传的差异政治则对这种求同的倾向进行了反思。

近二十年来,我国译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无论就广度而言,还是就其深度而言,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拓展,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吕俊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何为建构

主义翻译学”，主要内容是基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的不足及研究缺陷，解释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相关问题。他论述了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并着重介绍了建构主义理论及原则，包括其理论渊源、性质和特点；通过对以往几种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尤其是对结构主义翻译学思想的几个核心概念的反思与批评，阐述了为什么选择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译学研究；简要论述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作用与实践意义。

香港学者谭载喜教授对翻译比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翻译比喻粗分为十种。他立足于新世纪译学研究的描写原则和方法，从比较的和历时、共时的不同角度，对中西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各种翻译比喻做了一次较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并对搜集到的二百七十条中西翻译比喻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和深入探讨，以期填补译学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空缺。翻译比喻研究是帮助我们认识翻译的一个窗口，使我们领悟到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胡庚申教授在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再思”的发言中指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自问世以来，引起译界学人的兴趣和关注，尽管对此论首肯者居多，但也有人士对其中某些观点和某些表述尚存疑问。他在发言中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阐释：翻译活动与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有什么关系，怎样从“适应/选择”的视角解读翻译过程，如何从“适应/选择”的视角解释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怎样厘定“译者中心论”之后的译评标准，等等。他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一种宏观理论，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黄忠廉教授在题为“变译理论研究：进展与方向”的发言中，对“全译”与“变译”这两个概念作为翻译基本的立足点和观察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从翻译的历史、翻译的本质特征等5个方面考察了“全译”与“变译”的作用。李运兴教授的“论翻译语境——视野和视角”认为：(1)翻译研究话语的语境是多元的，由多种参数及其间的关系构成；(2)翻译研究话语的本质就是重构某翻译事件的语境要素，并对其进行描写。胡清平教授在其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词语层面的左证”中，试图运用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来分析和诠释词语的翻译问题。杨广俊教授则试图将句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约束理论、空余类、空操作数等范畴应用于翻译实践，以便有助于人们应对翻译中的歧义等问题。翻译研究一直以来都从相关学科，特别是从语言学的研究中汲取养分，因此他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努力为我们拓宽了视野。

穆雷教授谈到了翻译研究的方法问题。她主张定性分析通过定量研究使之科学化，呼吁科学研究方法，主张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严格的科学设计。她认为，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定性研究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体现其优势。

## 二、文化转向与翻译转向

从20世纪90年代起，翻译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更多地从文化角度看翻译，提出翻译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王宁教授在其题为“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发言中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他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

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构建。当前译学界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意义的翻译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因此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王宁教授呼吁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翻译转向,翻译研究应从外翻中走向中翻外,从西学东进走向东学西进,把中国的声音带到世界。翻译的本质作用,意在推动中西文化互动。

王宏印教授在其论文“文化的分层概念与文学翻译批评基础”中,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进行分层分析,认为就文学翻译评论而言的文化具有不同层面和含义:作为文明单位的文化;作为文学内容的文化;作为语言信息的文化;作为文本意义的文化和作为翻译对象的文化。他还在自由发言中就翻译与文化问题谈了十点意见:(1)泛文化的讨论不能进入学科研究的问题;(2)没有文化和文化的转向而直接进入翻译是不可能的;(3)“文化转向”以来的翻译研究又太“泛文化”,真正的文化问题却没有认真地进入翻译的各个层次并予以专业性的深究;(4)人们往往把文化说成词语翻译或直译加注释;(5)简单地说翻译就是异化或归化;(6)缺乏对翻译这个学科的认识,只是强调跨文化,但是对跨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太清楚;(7)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8)将文化与语言差异对立起来;(9)不加区分地滥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不加区分地说西方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东方文化就是弱势文化;(10)传播文化主义。他的发言被与会者概括为“王十点”。

台湾学者张上冠教授发言题目是“前瞻后顾——反思跨文化交流/翻译的互动”,他用德里达的解构法对美国文化对台湾地区文化的影响现象进行敏锐的反思,颇具颠覆性。张教授认为,跨文化交流的双方互相影响、相互渗透及交叉感染之中背负着沟通的职责。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与东方文化天朝主义的二元对立之间应达到某种制约、调节与平衡。在中西文化互动中,他对内地学者寄予厚望。同时,他指出两岸也要交流、互动,这次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澳门学者毛思慧教授认为,在后殖民背景下的阅读和翻译应注重文本文字,翻译的关键在于中英文的文字功底。他提出,要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抵抗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帝国主义话语,我们应努力构建自己的阅读与翻译立场。我们一方面要挑战帝国主义话语,一方面也要挑战自己。台湾学者邱汉平教授提交了论文“翻译与文学生产:谈汉字的中介位置”。他从翻译面向研究东亚——面对该地区语言与英语接触愈加频繁的情况——的文学与文化生产,探讨汉字在两种语言交会并置时扮演的角色。在东亚进入全球化之际,英语日益成为跨越地区与跨越文化的沟通媒介,中文则成为这个地区介于全球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文字。台湾学者庄婷婷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的报告。她认为,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使得翻译的读者群增加,促使英文成为最强势的国际语言;另一方面,翻译的本质倾向满足特定的读者群,使得其他语言也获得了发展。她的研究以中英翻译为例,讨论了全球化不仅对泛英文化有影响,对中文亦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此项研究的三个要点为:第一,全球化和本土化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第二,全球化对翻译本质的审思,对翻译对等观念的更新;第三,全球化对中英翻译的影响比照对翻译整体的影响。台湾学者王穗晖教授提交的论文通过比较华裔作品的两种中译手法,指出文化差异不必然是翻译文化论的唯一议题,文化等距即源于文化等同于译语文化也构成了

翻译的议题。她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翻译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针对近一个时期国内学术界、出版界、读书界对翻译界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有学者提出,译学界不能回避,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去介入,直面重大的实践问题,明确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学术观点,提出可行的应对措施。

### 三、文学翻译研究新探

长期以来,大凡谈到翻译,指的大都是文学翻译,因为文学翻译是翻译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翻译活动。在这次研讨会上,文学翻译专题研讨的精彩演讲犹如一系列丰富的文学翻译大餐,令人回味无穷。

中国译坛久负盛名、令人仰慕的北京大学许渊冲先生是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几十年来,他为将中国文化精粹推向世界而不遗余力。许先生向大会寄来题为“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的论文,由台湾学者彭辉荣教授代为宣读。许先生将中国传统美学在翻译方面的特征概括为“三之”、“三化”、“三美”。“三之”即:知之、好之、乐之。知之是低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理解;好之是中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喜欢;乐之是高标准,看译文能不能使读者愉快;知之是要达意,好之是要传情,乐之是要感动。“三化”即:深化、等化、浅化。“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许教授认为,“三化”是方法论,“三美”是本体论,“三之”则是目的论。三者之间和谐统一,体现了对翻译的高层次的审美品位。

如果说许教授的论文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与追求,那么上海交通大学毛荣贵教授的发言更引起人们对美的思考。毛教授阐述了“翻译的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的审美问题”。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即文化。语言的实用性、功利性及人性的弱点(如审美疲劳等)往往遮人耳目,让语言的本质属性——文化属性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他认为,翻译说到底还是语言文化之艺术。而文本的艺术和文化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的焦点。跨文化研究落实到零零整整的文化现象,不要让非本质的内容喧宾夺主。因此,从研究文化的角度对语言对比进行研究不容忽视。毛教授的三个主要观点是:(1)跨文化的语言对比研究要提升到一个审美视角和英汉语言研究对比的层面;(2)跨文化的研究落实到以审美视角,对双语进行对比研究要有效地克服所谓审美疲劳;(3)跨文化建设落实到翻译应该注意三变,即:变翻译实践为文化的研习;变冥思苦想为审美享受;变字面的转换为翻译的创作。

清华大学许建平教授结合翻译教学和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教学一直存在迷信权威的现象。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作品译文,只要出自名家,其见解就肯定高明,其手笔就必然是楷模典范。对于这种学术怪现象,许教授提出不同看法:名流大家疏漏错误亦不可避免。如据《红楼梦》现有的九个英译本中,最负盛名的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英国伦敦大学霍克斯教授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个译本各有所长,风格迥异。许教授认为这两家的译文并非尽善尽美。他紧扣《红楼梦》中有关史湘云一段文字,谈论了翻译中关于嚼舌头的处理问题,既是一个文字游戏,又是一个语音游戏。在他看来,两者处理都不够到位。许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在外语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翻译教学中,我们既需要学习借鉴,而同样重要的是批判扬弃,



不可盲从。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张经浩教授在题为“从‘麦琪’谈翻译中文化的排异性”的发言中，以实例分析说明了“圣贤的礼物”优于“麦琪的礼物”的道理。他认为，各种文化都属于特定的人群，有各自的特点和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由于这个原因，不同文化虽然可以交流和互补，但每种文化都有排异性。正由于有排异性，每种文化才能保持其独立性。在翻译中，译者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化的排异性，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只有这样，译文才有可能被读者顺利接受，促进文化的交流，这就是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辩证法。

澳门理工大学贝尔语言中心毛思慧教授在自由发言中对“审美疲劳”问题提出他的担忧。他认为，所谓“审美疲劳”是人们曾经认为其美、由于某种原因疲劳了。但是，有些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其美，也疲劳了，这时，又怎样看待“审美疲劳”这个话题呢？这些问题发人深省，从不同层面引发人们对美的思考。

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曾泰元教授还谈了文化特色词的英译问题。他认为文化特色词的英译，理想上是直接叫出英语里的汉语外来词，若无，就依汉语拼音造词，推介给英语。英语词汇虽广纳百川，但对汉语的接受度或许有其极限，因此不妨将拼音造词与定语修饰词并列（如“长袍”changpao, or Mandarin gown、“粽子”zongzi, or Chinese tamale），交由语言的市场机制定夺。自由竞争过一阵子之后，情势总会逐渐明朗，如“当归”的英译，在 Chinese angelica 和 dong quai 摆荡多时之后，现已由 dong quai 胜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世界的目光都将集中于此，翻译工作者理应掌握此一难得契机，借由传媒无远弗届的力量，既能弘扬中华文化，又能大量地丰富英语里的汉语外来词。此论不失为一良策。

苏州大学王宏教授“让墨子走向世界”以其题目新颖而格外引人注目。他指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墨子学说和墨学思想研究已引起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他在论文中着重从墨子其人其书、墨子研究以及《墨子》的英译本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谈到翻译本体研究时，王教授认为，翻译本体研究应该作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和重心，不能让所谓的翻译研究淹没在所谓的文化研究里。他把翻译的本体研究比作自留地，把自留地种好，然后可以出去吃点“草”。王教授认为，翻译的本体回归是文本研究。翻译的译文是中国和西方文字杂交体，是集两种语言之美于一身的 Interlanguage，优势杂交是美的译文，否则，是蹩脚的译文。两种语言美结合起来的译文才会更美。任何译文都是针对不同的主体，基本标准即美的标准是永远存在的。

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张梦井教授在题为“论长篇小说作品的多侧面信息和翻译的相应对策”发言中提出，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如同五彩球一样是一种多侧面的立体艺术品。每个侧面不同的色彩使这件艺术品形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整体。每一个侧面又都能传达一种信息。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译者不能局限于仅仅表达这部文学作品的情节信息，而应当充分地传达它的不同侧面传递的信息。张教授认为，文学作品中多层次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通过情节的描写来表达基本信息和通过描写主人翁的语言来表达基本思想）和次要信息（文化信息、心理信息、环境信息）。为了能够充分表达文学作品中不同侧面的信息，翻译者可利用：修辞手段、推敲、考证、揣测、逻辑分析等方法。张教授的报告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

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赖慈芸博士的研究取材自海峡两岸十种文本的中译本，包括

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一般非小说读物等,以标点、字数、语汇、语法、翻译单位、比喻的翻译方法等项目作为指标,描述了两地学者在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差异。赖博士指出,台湾战前为日本殖民地,从战后才开始以国语/普通话为官方语言,因此战后二十年间,翻译书籍以翻印大陆旧译(多为三四十年代的译本)为主。60年代开始出现台湾生产的翻译书籍,翻译规范与旧译并没有太大的歧异。80年代末期开始,内地简体翻译作品陆续进入台湾出版市场,但此时的两岸翻译规范呈现巨大差异,台湾若要出版简体译本,皆须经过编辑大幅度的改动,修改不合本地习惯的用词与语法结构。近年来两岸译本交流越来越频繁,常有简体繁体其实为同一译本的情况,但似乎仍须经过当地编辑的处理。赖博士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两岸学者沟通交流的必要性。

#### 四、意识形态视角的翻译研究

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廖七一教授的“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中国化”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来探讨翻译的。他认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哀希腊》被误读和挪用。在梁启超对诗人拜伦形象的构建中,西方的“自由”概念被误读,个人自由与民族国家得到整合并进而让位于救亡与启蒙的主流意识形态。梁启超翻译的《哀希腊》成功地实践了他的政治意图;他提倡的翻译功利观和文化本位为其后许多翻译家所效仿。梁启超的翻译不仅构建了异域的文本和文化身份,同时也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通过“映照”或自我认识,“读者认同于一个由翻译投射出来的理想”和主导的价值观念,进而构建了近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文化身份。从此,梁启超节译的《哀希腊》所传达的旨意和构建的拜伦形象一再被丰富和强化,以至于在民国以后,甚至在1949年以后《哀希腊》仍持续受到译界的关注。他所构建的拜伦和《哀希腊》的形象,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宝贵的文化资源,进入民族救亡的文化语境,并与中国的现代复兴融为一体。廖教授这篇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表明,在文学翻译中建构起来的外国文学形象的差合是自我政治意图和艺术理念的投射。他的研究对我们如何从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讨翻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州大学外语学院周领顺教授在题为“史证严复本意——兼及‘信、达、雅’的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报告中,通过对史料的比较,证明了“信、达、雅”的意义与传统上的理解稍有出入,严复的本意应该加以澄清。他的研究发现,“信”=“诚”(作者对读者)=“质”(内容)=“情信”=“真”(译者主要对作者),“达”=“通达”(意义)=翻译的低标准,“雅”=“辞巧”=“文”(形式)=修饰(包括“文”在内,以“行远”)=翻译的高标准。而且,三字标准也不应该作为纯粹的文学翻译标准来看待。他认为,中式思维和汉语语言精确度差但涵盖力强的特点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而且能与现行的翻译理论,包括像逻辑性和系统性都比较强的西方翻译理论相契合。因此,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将新的翻译研究所得注入“信、达、雅”等传统的中国翻译标准之中,使其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彭辉荣教授的题为“当中国道士遇上德西达时——混用老庄思想翻译德里达成名文章《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几个有趣问题”的论文,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德里达的作品难以被中国学生理解。但老子的思想与德里达的思想却有共同

之处,因而彭教授试图通过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作品)的翻译帮助中国学生理解德里达。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用老子道德经看解构主义;二是用庄子思想看解构主义;三是解释解构主义的几个重点;四是混用老庄思想去翻译《结构、符号与游戏》时会碰到的几个有趣问题等。

彭教授通过具体翻译实例,把老庄哲学思想与德里达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相互贯通,使对其理解和认识提升到理性高度,从而加深了对理论内核的领悟。这篇发言的立意之新颖,思路之开阔,见解之精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五、口笔译教学研究的亮点

口笔译教学与研究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口译理论研究的专题研讨中的一个热点议题。

台北大学应用外语学系陈彦豪教授在题为“从跨文化角度看当代谈判口译的理论与实践”的发言中,分析了口译修辞语言与非语言语意行为的特质,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了在辩论、暗示、提议、配套、议价、结束与签署等不同谈判阶段中口译理论的应用。他从正确度、完整度、清晰度等谈判口译的评鉴指标出发,强化了当代谈判口译理论与实践,并提出具体建议。陈教授的发言角度新颖,思路清晰,有理有据,集中探讨了现有口译理论研究中较少涉及,甚至尚未探讨的相关问题,令人大开眼界。

北京科技传媒大学外语学院贾红霞副教授谈论的是“从翻译的目的论视角看译员译前的准备工作”。她认为,口译前译员可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口译的目的和听众的特殊要求,从发言人的大量信息中选择发言内容。由于发言人的讲话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发言人在发言时除了需要语言上的转换之外,还要考虑非语言因素的转换,例如声音、肢体语言因素的转换等。作为译员,他/她有责任帮助发言人做好多层面的转换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达到交际的目的。该篇发言从“译员译前的职责”出发探讨口译问题,其视角是新颖的,但从现场发言来看,若能进行更深入的调研、例证和概括,效果会更好。

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系的谢怡玲博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口译问题。她在论文“角色呈现之管理——医疗口译员于双语医病互动中扮演之场域管控”的宣讲中,检视了医疗口译员在医病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传播、语言、口译策略,阐述了译员如何管理、协调传播活动的各个参与者(如医生、病人)之角色呈现以及如何因应他人对译员角色的期待等问题。谢博士以实证的方法取得 12 个医病互动的真实案例和与 26 位专业医疗口译员的深度访谈记录。她的研究结果显示,医疗口译员的口译方式、传播策略与活动参与者的互动和沟通方式是相互影响的。这篇论文发言的内容丰富、视角新异、论述深刻,可以说填补了国内在医疗口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一个空白。此外,她采用实证性的方法来研究口译工作,令人颇受启发,也值得借鉴。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王立弟教授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口译的认知问题。他在综述 David Gerver(1976)的“同声传译过程的模式”和 Moser(1978)的“同声传译的过程模式”等相关研究之后,介绍了同声传译所使用的基本原理,即“顺句驱动”原理,

并指出此原理在同声传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介词短语、分词结构、形容词和副词分句、条件句、比较句以及被动句在传译过程中如何处理的问题。王教授阐述了包括修改序列模式、并行处理模式等在内的话语处理的性质;还涉及语言输入的结构,即语音结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和信息结构等。不难看出,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口译的认知问题,听起来难免有些抽象;而大凡牵涉到人的认知方面的研究,又总是复杂的和不易把握的。然而,从心理和认知的视角研究口译问题,的确又是值得尝试的和难能可贵的。

会议讨论中大家认为,口译理论研究应多向其他学科吸收营养、学习借鉴,以便发展、壮大自身的研究。口译理论是整个翻译理论的完善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了解译员翻译前后及翻译过程中受到影响的各种因素,研究者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口译活动,从而关注如何使译员减少在跨文化口译过程中的失误,关注如何使口译教师能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方式培养译员。

其次,口译教学是培养优秀译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口译教学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培养出的译员的水平,因此,哪种教学方式更有利于优秀译员的培养是每一位口译教师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台湾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的陈圣杰博士以“用影音教材从事谈判口译训练”为题目,探讨了如何使用影音教材在台湾的一所大学的硕士在职班教授口译的问题。针对谈判口译员要求的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欠缺、学生听力差不能从事口译、口译课程不易开设等现象,陈博士的研究采用了行动研究方式,首先发现问题并从课程设计与教学中寻找答案,然后使用质的研究法收集、分析数据,完成本项研究。他的研究资料包括口译教材、教案、现场观察记录、学生学习心得报告、面谈等。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影音教材可以(1)克服开课难的问题;(2)培养学生自动口译的能力;(3)有利于实施渐进式教学法;(4)提高学生的听力;(5)使多元化的教材利于教学;(6)使考试方式实用、有趣;(7)使学生喜欢多媒体教学;(8)使教学成果获得肯定。陈博士对口译教学方法的研究及其独特的教学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口译教学法的研究应该是多样的和有所创新的,这样才有利于优秀译员的培养和教学资源能够充分、合理、科学地利用。

台湾中华航空口译训练部主管高政英博士有着丰富的口译经验和十余年的训练译员的经历。发言中,她谈到两次为李登辉做同声传译的得失。她认为,译员除了注意语音、语调、类语言的运用等语言问题外,还要按个人习惯或喜爱的符号做好速记。她提出,如何着装与口译过程中的效果也有关系,应引起译员的注意;同时,译员(与外籍译员)之间的互动也不能忽视。当有人问及如何为口译工作做准备以及如何培训译员时,高博士强调说:“笔译是口译的基础。没有深厚的笔译功底,口译便很难做好。”作为一位工作在第一线的译员,她的话可谓肺腑之言。很难想像,一位笔译功夫很差的译者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译员。

其三,口笔译理论与教学结合继续收到重视。笔译理论、实践与教学在翻译领域向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和关注的对象。

浙江大学翻译研究所陈刚教授根据自己长期的特级导游经验、又结合《鹿鼎记》英译文本,阐述了归化口笔译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导作用。他阐述了运用“归化”方法处理《鹿鼎记》翻译的深层原因,并对汉译英策略的发展趋势得出六项初步结论:(1)文化全球化进程

中的跨文化交际势必展现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这自然造成汉英翻译之间的障碍,这种障碍将长期存在下去;(2)“归化”翻译(策略)在汉英交流中将继续占主导地位;(3)即使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若使讲英语的本人理解、欣赏并且接受以完全异化的语言符号包装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还将遥遥无期;(4)只要中英语言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现在这样巨大的差异,不懂中文的、讲英语的人是几乎不可能直接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5)“归化”翻译策略还将持续发展,其所持续的时间难以预测;(6)然而,在英汉交流中,“异化”翻译(主要指局部的翻译)将越来越受到译者和中国读者的青睐。这篇发言的内容丰富,阐述详细,演讲人也信心十足。但影响《鹿鼎记》翻译策略的因素也许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比如把《鹿鼎记》当作文学名著的翻译策略与当成流行文本的翻译策略就会有所不同;译入语、译出语在文化、国情方面的强弱恐怕也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商丘师范学院外文系轩治峰教授则是从译入语语内重构的角度评析张培基、庄传绎、孟庆升等人的翻译教程。演讲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讨论张、庄、孟等人各自编写的教程中的语篇翻译失误及其原因,说明译入语语内重构的重要性以及译入语语内重构时应考虑的因素和应注意的事项,并提醒读者编写教程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否则,将误人子弟。演讲者引用了奈达的“翻译过程”四个阶段的划分和分工,强调了译入语语内重构的重要性及其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轩教授的论文在范例方面的精细讨论和对比分析颇值得称道。

台湾高雄文藻外语学院法文系雍宜钦教授把“创意思考”运用于翻译教学值得一提。雍教授宣读论文的题目是“创意思考于翻译教学之应用:以‘动’字为例”。她把翻译列为外语学习中除听、说、读、写之外的第五种能力,认为翻译是对一个外语学习者语言掌握程度的检验。在介绍了“创意思考”的意义和创意四P(Person, Process, Product, Place)之后,她描述了创意思考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建议学生创意思考,多问问题少问答案;学生分组以方便课程的教授;鼓励多发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互动;资源共享等。她设计的课程的实施流程为:第一周,抛出问题;第二周,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只是“陪伴者”,不作任何评论;第三周,各组做报告。采取的评判方式是:建立学生个人数据簿取代传统的给分方式。雍教授以“动”字为例,具体说明这套教学方法的实施:从“动”字来探讨中法互译中出现的问题,实例包括诗的翻译、寓言的翻译以及对联的翻译等。学生被分为十组,结果就有十种不同的创意。学生对这种教学法的回馈是:激发创意,借此去思考更多中法文之间的差异;有更广的思考空间;单一字的思考,由易入难,由简到繁,是个很好的活动程序。与会者对此课题颇感兴趣,认为这是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转化,对今后的大学外语教学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特别是雍教授提倡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教师起着“陪伴者”作用的想法和做法,对大学外语教师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

## 六、几个值得再思的问题和个人的几点感受

通过这次专题会议,我们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是关于翻译本体研究与文化比较研究的关系问题。在研讨会中,无论是王宏教授的发言,还是许钧教授的讲话,或是毛思慧教授的呼吁,都涉及翻译的本体回归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文化研究。相反,两者应该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相

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会议中提出这个问题,表明这个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是关于审美疲劳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人们往往对本族语言产生疲劳,保持不了审美的敏锐性;另一方面,由于对异族语言的文化和背景了解不深入或者欣赏水平不够,往往难以达到较高的审美程度。再则,职业翻译者又较多地机械性地翻译转换,也往往不易保持审美的敏感性。这样一来,审美的敏感性问题,特别是审美疲劳问题便油然而生了。看来,这个问题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三是关于意识形态与翻译作品的关系问题。从个案研究中发现翻译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揭示翻译怎样在文化层面对一个国家兴衰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种具有导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努力。将翻译活动与意识形态关联并提升到社会进步的高度,有助于彰显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角色;以小见大的细腻研究,又有利于选题定位和缜密论证。这方面的力作并不多见,因而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发起和组织此次研讨会,笔者也感受良多。

其一,创新应成为翻译学科发展的动力。学术创新是每个学科都应该鼓励并提倡的,翻译学发展也不例外。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们选题之新异、立意之深刻、方法之创新,实属难能可贵。关于翻译与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对严复“信、达、雅”的重新解读、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检视与再思、从句法学视角看翻译实践等等,都是有创意的思考和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不敢承担责任和不够创新的态度是阻碍一个学科发展的绊脚石。翻译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目前就是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和相应的翻译规范和标准。我们认为,创新应成为翻译学科发展的动力;翻译研究的创新和创意的思考,应该成为翻译研究者的一种追求。

其二,翻译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翻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有所涉及。穆雷教授及其弟子邢杰同学探讨了定性、定量在翻译学研究上的应用问题,与之相呼应的是谢怡玲博士采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口译工作、王立弟教授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口译认知问题等。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使我们认识到研究方法的普适性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共通性和可借鉴性。我们认为,注意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借用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才有利于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其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要平等对话。此次会议有意打破“门户”,既约请多位为建立翻译学和加强翻译理论建设而不遗余力的知名教授,同时还兼顾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从而使大家有机会平等地对话交流。同时,会议中听众对发言者勇于提问、敢于质疑,也构成了此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我们认为,学术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反之则并非正常。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平等对话、相互提醒和相互理解,这对我国翻译学科更加“清醒”、“冷静”地发展,只会有好处。而对于学术会议来说,与会者勇于提问、敢于质疑,无疑有助于丰富研讨的内容,有利于激发与会者积极的思考,这样的研讨会也才会更有趣。

第四,两岸学者沟通、交流确有必要。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虽然海峡两岸学者“同文同种”,但由于长期的隔离,仅在文化理解和语言运用方面就有不少差异。比如,会议通知中我们写有“食宿费回本单位报销”,这种说法在内地很常见,不会引起误

解；但一些台湾与会者却来函电提出“……费是否要到清华大学报销？”之类的问题。还有台湾朋友询问“清华大学近春园客舍是否有空调？”、“会议报告厅是否有 Powerpoint 设备？”等等。又比如，台湾同行常用“考虑”、“体认”、“学门”等词语，内地学者却较少使用；而内地人士文章中常用的“的”，在台湾朋友的文章里又多变成了“之”，如此等等。我们认为，了解和研究这种差异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同时，这种情况也说明，两岸的交流迫切需要，交流的常态化也确有必要。

我们编辑这本文集的目的，就是想让与会者的新论、高见、博学、雄辩等再以文字形式与大家分享，以飨读者。

---

\* 编者按：本文集收录了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地学者的论文，为了尊重原作者起见，除因全书统一而在必要处稍作调整外，论文内容未作改动，即文责自负，特此说明。

## 目 录

主编序言/胡庚申 .....	I
----------------	---

## 译学发展与译论研究

如何推动翻译学的建设与发展/杨自俭 .....	3
我国译学界当前应该面对的几个重大问题/许 钧 .....	7
翻译比喻中西探幽/谭载喜 .....	8
“存异”还是“化同”	
——从东西方话语交流的角度看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刘亚猛 .....	20
“翻译适应选择论”再思/胡庚申 .....	25
论翻译语境	
——视角和视野/李运兴 .....	37
从句法学看翻译理论/杨广俊 .....	44
翻译的创造性/曹丽娟 .....	47
透过 TRADOS WinAlign 匹配编辑之翻译等值描述性研究/史宗玲 .....	53
翻译研究中的定性研究/邢 杰 穆 雷 .....	65
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求同倾向/孙会军 .....	73
从解构到翻译	
——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陈永国 .....	81
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抵抗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帝国主义话语	
——从阅读 Johan Galtung 谈起/毛思慧 .....	90

## 文化转向与翻译转向

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王 宁 .....	101
文化的分层概念与文学翻译批评基础/王宏印 .....	110
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局限性/李树德 .....	115
归化翻译与彰显中国文化	
——《鹿鼎记》归化译本研究/陈 刚 .....	122



当中国道士遇上德西达时 ——混用老庄思想翻译德西达成名文章《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几个有趣 问题/彭辉荣 .....	130
译途佳境跨时空/穆凤良 .....	132

##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

前瞻后顾 ——反思跨文化交流的互动/张上冠 .....	143
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庄焱婷 .....	153
国家的翻译政策/张秀珍 .....	162
“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词语层面的左证/陈 红 胡清平 .....	169
“零翻译”现象及其研究/宋志平 .....	175
翻译类畅销书在台湾地区的文化政治/李根芳 .....	176
从术语学建设看两岸合作交流/吴静霓 黄忠廉 李亚舒 .....	191
欧盟翻译工作对海峡两岸翻译理论研究的启发/胡功泽 .....	201
“意象语言”对翻译之影响/徐慧韵 .....	207
满大人,求你思! ——由 Mandarin、Chinese 谈文化特色词的英译/曾泰元 .....	213
两岸翻译规范差异的初步描述/赖慈芸 .....	219
顺应规范,变通自如 ——画册《美国环球自愿者在中国》(汉英对照)读后/许建忠 .....	221
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翻译 ——简评清末民初科幻小说的译介(1900—1919)/姜 倩 .....	226
论林语堂著译作品在海外的商业成功/褚东伟 .....	236

## 文学翻译新论

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许渊冲 .....	245
美学理论 ——指导翻译实践的一盏明灯/毛荣贵 .....	248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梁根顺 班荣学 .....	264
描写框架下译者风格研究方法新探 ——浅谈翻译语料库的建立和应用/慕媛媛 .....	271
借鉴与扬弃/许建平 .....	279
翻译家研究的“本体回归” ——梁实秋的文学翻译观探源/赵军峰 .....	284